

全球矚目的「中國（上海）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以下簡稱「上海自貿區」），在8月22日經過國務院批覆、9月27日對外公布，並在9月29日正式掛牌後開始運作。

目前，第一批進駐自貿區的企業共有36家，涵蓋金融、商貿、文化、通信、跨境電子商務等多個領域。其中11家金融機構包括工行、農行、中行、建行、交行、招行、浦發銀行及上海銀行（分行），交銀金融租賃公司（專業子公司），以及花旗、星展2家外資銀行（支行）。至於台灣的金融業，據媒體報導，目前已在上海設分行的台灣銀行及土地銀行有意在年底前設立據點，而包括國泰世華銀、中信銀、開發租賃、一銀等多家金融業者也收到說帖，正在評估當中。

依據國務院公佈的總體方案，上海自貿區是中共中央、國務院作出的重大決策，它的使命就是成為「進一步融入經濟全球化的重要載體，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作出貢獻」，這個使命完全是基於「國家戰略需要」。

它的總體目標包括：「建設成為具有國際水準的投資貿易便利、貨幣兌換自由、監管高效便捷、法制環境規範的自由貿易試驗區，為擴大開放和深化改革探索新思路和新途徑，更好地為全國服務」。自貿區目前開放服務業的六個領域，分別為金融服務、航運服務、商貿服務、專業服務、文化服務以及社會服務，涉及18項行業的開放。

簡而言之，自貿區的設立，目標就是要朝向自由化、開放的方向去改革，希望自貿區的開放經驗未來能夠擴大、複製，作為其他地區跟進以及上海自貿區進一步開放的典範與參考。而其手段就包括行政審批的簡化、對於管制行業別以及相關規範的鬆綁，其中，人民幣的自由兌換、金融業及文化事業是關注的重點。

以「開放」逼迫地方政府改革？

1980年代深圳特區的成功，確立了中國轉向資本主義的發展路線，帶動了中國的經濟起飛。經歷數十年的高速成長，中國經濟增速開始減緩，經濟與產業型態面臨轉型的壓力，若不能順利轉型則可能陷入衰退、造成不穩、進而危及中共政權的統治。習李上台後，各界都在期待新領導班子將端出何種政經改革方案，也因此，有不少媒體將上海自貿區詮釋為35年來在經濟市場化的基礎上所進行的又一次重大改革。

有評論者認為，像採取「負面表列」的「負面清單管理」作法，區內除了禁止項目外一律可以投資營運，就是一種「倒逼」地方政府簡化、鬆綁行政管制的手段。因為，中國地方政府追逐GDP增長的競爭模式、日益介入市場、甚至有些地方政府就像一個企業，干預無所不在，已經成為經濟增長的阻礙。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於是在上海的邊緣圈出一個自貿區，建立國際化、法制化的「新遊戲規則」，以此作為施壓其他地方政府跟進的標準。

依據九月底公佈的第一批「負面清單」，目前自貿區內禁止投資的行業，有關金融業的條款顯示，外資企業將限制投資銀行、保險公司（壽險公司外資比例不得超過50%）、保險中介機構、證券公司（外方參股比例不得超過49%）和小額貸款公司。在房地產領域，外資企業將限制投資土地成片開發、限制房地產中介或經紀，限制投資高檔賓館和高檔寫字樓、禁止投資別墅的建設經營。在文化產業，外資企業禁止投資新聞機構、禁止投資圖書、報紙、和期刊的出版業務、禁止投資廣電節目製作經營公司和電影製作公司、禁止投資網吧、禁止投資博彩業和色情業。

「負面清單」突顯部門衝突 改革仍將緩慢且艱難

有論者以為，事實上，自貿區的「負面清單」中禁止和限制投資的領域，與現行規範外資投資項目的「禁止類」和「限制類」的清單，並沒有太大的不同。亦即，如果說是要以自由化、國際化來減少審批流程造成的發展障礙，至少目前的自貿區並沒有特別讓人耳目一新。華爾街日報報導指出，銀行界人士和專家認為，這份內容廣泛的負面清單，可能令讓自貿區對外資的吸引力大打折扣，同時也反映出，對於開放的幅度與速度，中國政府各部門之間是存在矛盾與博弈的。這顯示雖然領導人表現出改革的態度並有所動作，但在這樣的受管控的環境下，金融領域及其他改革的進展仍將是緩慢而艱難。

不過，自貿區的許多具體政策仍在討論中。中國政府也在文件中表示，「負面清單」未來將會逐年調整。顯示北京對於與自由市場銜接、走向「開放」的過程仍是小心翼翼，謹慎前行，確保過程中隨時「可放可收可修」。

對於上海自貿區未來將會如何，有人期望，有人失望，不過，目前看來，更多的是觀望。但筆者以為，上海自貿區從一個地方的經濟實驗區、位階一路「上調」到冠上「中國」兩個字的國家級自由貿易實驗區，顯示在中共領導人的思維當中，確實希望藉由這個試驗區實踐一些想法、或改革的手段，無論是外界期待很高的金融自由化，或是意涵更為深遠的「以自貿區促成經濟體制的改革」。

「克強經濟學」：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

日本首相安倍上台之後，推出「安倍經濟學」，射出「三支箭」：包括以寬鬆貨幣政策打擊通貨緊縮，透過擴大貨幣供、給讓日圓貶值，提升出口競爭力；其次，擴大政府支出以刺激經濟成長，投入1,100億美元的擴大預算投入公共建設；第三支箭則是進行經濟結構改革，希望建立長期穩定的成長策略。外界對安倍的經改方案有褒有貶，他的貨幣寬鬆政策確實收到效果，消費者物價指數上升，製造業獲利改善，股市也開始走揚。但長期來看，貶值將使影響日本的償債能力，必須要進行財政與經濟的結構改革，才能真正將日本拉出低迷的泥淖。

不讓安倍專美於前，中國也有「克強經濟學」。去年開始，中國經濟究竟是「硬著陸」或「軟著陸」再度成為全球關注焦點，經濟增長速度減緩成為新領導班子的重大挑戰。總理李克強上任之後，3月20日在國務院第一次全體會議上提出「穩增長、防通脹、控風險，促轉型」。今年7月李克強在廣西主持召開部分省區經濟形勢座談會時，提出「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9月12日在大連的夏季達沃斯論壇致詞時，李克強再度強調「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這個發展原包括三個重點，一是兼顧當前和長遠，穩定宏觀經濟政策。二是堅定不移推進改革開放，著力激發市場活力，重點是轉變政府職能，推進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同時要促進開放，包括在上海建立自由貿易試驗區，探索負面清單管理模式，在投資准入、服務貿易領域擴大開放。第三是著眼轉型升級，調整優化結構。

不同於安倍的寬鬆貨幣政策與擴張公共支出，「克強經濟學」不採擴大赤字、刺激經濟的方法，強調「穩健的宏觀調控」，以穩增長、保就業作為「下限」，以通膨作為「上限」，只要經濟運行處在合理區間，經濟總量政策就保持基本穩定。重點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關鍵仍是改革創新，釋放出內需潛力，以協助轉型。

政、經路線背離，「中國夢」能否在平穩中實現？

強調開放、國際化、法制化的上海自貿區的啟動，以及今年以來李克強針對「克強經濟學

」的一系列闡述，讓外界推測，在11月召開的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上將公布的經濟改革方案，是否會出現更清楚、具體的改革宣示，這也是上海自貿區的開放程度受到高度關注的原因之一。

習李甫上台時，外界對於新領導班子將推行政治改革有高度期待，但目前多數人都是失望的。習近平上台後對於言論與思想控制的動作頻頻，例如，仿效毛澤東時代為消滅敵人和加強思想道德約束而展開的「整風」運動、啟動為期一年的黨風廉政建設工作，發出文件要求高校教師「七不講」，近期又親自坐鎮地方官員的「批鬥會」，重現文革時期的「批評和自我批評」，以及重新編印紅寶書（毛語錄）等，有人形容，習近平逐漸顯露出他的左傾立場，他正在實踐一個「沒有薄熙來的薄熙來政策」，透過向毛澤東靠攏，鞏固權力。外界多數認為，這顯示習近平不會進行有力的（符合自由派人士期望的）政治改革。

從現況看來，目前北京的作法，是一種「經濟向右、政治向左」的途徑。當然，北京很清楚知道，經濟發展失去力道，一切都將是空談，就算有政改也支撐不住共產黨的政權。因此，優先順序是明確的，經濟轉型第一，其他則是在經濟轉型中求穩。不過，政治制度沒有配合經濟的轉型、甚至是開放，這最終將成為世界上首見、成功的「中國模式」？還是在分配與發展失衡的衝擊下，讓社會矛盾更形嚴重？

上海自貿區佔地僅28平方公里，從土地規模來看，說它是中共中央高度重視的、具重大改革意義的經濟示範區，讓人感覺有點牽強。事實上，掛牌當天，原本預期會出席的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卻沒有出席，讓人懷疑此舉否是希望「降溫」、或劃清界線，以免各界期待過高？或許，將上海自貿區看成是「克強經濟學」中向世界更進一步開放的一場小規模試驗，會更貼近事實。

不過，上海自貿區也是上述「政經背離」路線的試驗。它的成功與否，將影響中國未來的經濟改革幅度，攸關「克強經濟學」能否進一步落實。另一方面，這個「經濟開放、政治保守」的背離路線，是否能夠讓具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市場體制帶領中國順利完成經濟轉型、真正讓廣大人民都分享到發展的成果，解決貧富差距惡化的問題，在過程中維持穩定，讓升級版的中國經濟撐起「中國夢」；還是讓專制統治下的衝突更為突出，考驗著北京領導班子的政治智慧。

作者吳敏之為政治工作者